

中国近代史丛书

陈旭麓 主编

朱执信

余炎光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莫永明
封面题字 周慧珺

中国近代史丛书

陈旭麓 主编

朱执信

余炎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5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虹桥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25 字数 58,000

1984 年 4 月第 1 版 198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000

书号 11074·585 定价(六)0.28 元

出版说明

这一套《中国近代史丛书》，现已出版《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及《林则徐》《黄遵宪》《秋瑾》《孙中山》等二十余种。为了适应读者的需要，今后将继续组织出版有关近代中国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等方面题材的书；每本由四万到十万字不等。热诚希望得到同志们的帮助和支持。



朱执信像

目 录

一、出身于“书香门第”	1
二、由“排满”而革命	6
三、初露锋芒.....	13
四、“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	20
五、积极投身武装起义	27
六、发动民军，光复广东	39
七、“政权建设”之梦.....	47
八、为民主、共和理想而战	54
九、新的探索.....	66
十、跟上时代的潮流.....	76
十一、虎门殉难.....	87

一、出身于“书香门第”

一八八五年十月十二日(清光绪十一年，乙酉九月初五日)，朱执信出生于广州城内豪贤街外祖父的“汪氏随山馆”。那一天，恰好收到他的舅父汪辛伯(兆铨)中举的捷报，外祖父在双喜临门高兴之余，便赐给外孙以一个“举”字，作为乳名。朱举便成了朱执信少年时代常用的名字。

朱执信，原名大符，执信是他的字。因排行第三，在同辈亲友中亦称“朱三哥”。原籍浙江萧山，自从曾祖父开始在广东作官，祖父荔初则长期在广州各衙门充当“师爷”，家属遂定居广州，人们习惯上把他们作为广东番禺人。

朱执信的父亲启连，是一个知名的知识分子。他的诗在光绪年间颇有声誉。他还十分爱好击琴、书法和金石，曾自刻印章称“琴皇帝”。朱执信后来曾用“琴生”作别名，大概就是据此而来的。

朱执信的母亲汪若昭也勤奋好学，读了不少古籍，诗词文章都写得不错。尤其熟悉文天祥、史可法、陈子壮等人的英雄事迹，并常常向儿女们讲述这些历史人物的故事，以训诲后辈。^①

^① 参见朱秩如《朱执信革命事迹述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下同)，第四四四页。

朱执信从五岁开始，就在父母亲的督导下，勤奋读书。几年间，先后读完了“四书”、“五经”以及《资治通鉴》等古籍，还读了许多唐、宋以及其他朝代著名作家的诗文。他的父亲对儿女们的学习，要求严格，提出“学必贯通古今”，并要“以实学为务”^①。课余则常常和朱执信纵论中国历史上的兴革利弊以及当前的政治情势，诱导朱执信朝着学以致用的方向发展。

因为家学渊源的影响，朱执信少年时代即显露他的才智。十二岁那年，外祖父汪瑔家中延聘了广州有名望的塾师章奏篪。但是，章奏篪到汪家授课还不到一个月，即提出辞职。汪家和朱家的长辈向他查询辞职的原因，章奏篪列举了好几条，其中之一是怕耽误了这些弟子的学业。章奏篪说：

朱大符嵌寄磊落，昂昂若千里驹，闻一知十，无所留滞，而文思潮涌，下笔千言，议论雄放处，虽老师宿儒，亦所不逮，其才非吾力能胜任，何敢素餐以误人子弟哉！^②

随后，汪家聘请朱执信的姨夫、广州有名的老秀才沈孝芬（藻清）为塾师，朱执信和他的四弟大猷（秩如），以及四从母舅汪兆铭（精卫）、表兄弟汪祖泽、汪希文等同窗，都成了沈孝芬的弟子。朱执信从沈孝芬读书达四五年之久，他的国学基础，就是在这时打下的。

①② 张堇溪撰、汪祖泽参订：《朱执信先生年谱》（油印本），第三页。



少年时代的朱执信

到了十六岁，朱执信又跟随二从母舅汪仲器（兆铿）学习数学。他对数学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和超卓的才能。“自弧三角以上至微分、积分及立体几何、解析几何等，则自读书籍而习之，每夜研钻，非至四更不就寝。不独能忆各公式，且深明各公式由来之原理与其应用之范围。不独谙新式之算法，各正史之天文志、律历志，周髀、算经、勾股、开方、捷数，数理精蕴、历象考成、中西算学大成，华蘅芳、梅定九算书，则古昔斋算术等，自古代以至前清时代诸算书，无不探其蕴奥。”^①

一九〇〇年，朱执信的父亲启连，因染鼠疫去世。执信同母亲及两姊一弟两妹，一家数口，生活和学业两无着落。幸而舅父汪兆铨受妹夫之托，承担了对执信全家的教养。一九〇二年，执信的母亲又去世。^②所以，朱执信的成长，受汪兆铨的帮助和影响是不小的。一九一九年朱执信在一首《怀辛伯先生》的诗中，说：“饮食与教诲，有逾父母恩。”^③

家庭教育不仅给予朱执信的学识增长以积极的推动，而且，对朱执信的思想品德的形成也起了良好的作用。他父亲常以其耿介言行教育子弟，曾经对朱执信说：“尔不患不成名，然当思名应与实称，不要如世俗之沽名钓誉而沾沾

① 朱秩如：《先兄执信行状》，《朱执信集》下册，上海民智书局一九二五年版，第六九二页。

② 朱执信母亲去世的时间，《朱执信先生年谱》（油印本）则作一九〇四年，此处据朱秩如的回忆推算。

③ 《朱执信集》下册，上海民智书局一九二五年版，第六八九页。

自喜为也！”^①同时，他对科举考试中那种追逐名位的行径也异常鄙视，朱执信都一一铭记心坎。朱执信的四弟朱秩如说：“先兄好读史而不甚好训诂之学，好古文诗而不好八股文试帖诗，好临帖习字而不好习大卷字。”^②朱执信和他的父亲一样，为了表示和科举决绝，在辛亥以前，一直以萧山人自居，^③并始终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④

在这个“书香世家”里，朱执信度过了他的童年。

① 张堇溪撰、汪祖泽参订：《朱执信先生年谱》（油印本），第四页。

② 朱秩如：《追忆先兄执信》，中国国民党广州特别市党部编：《朱执信先生殉国十周年纪念册》，第五九页。

③ 在朱执信遗留下来的一批图章中，称“萧山朱大符”的有好几枚，但没有发现称番禹的。朱执信的这批自用图章，包括有执信、悬解、蛰伸、龙蛇之蛰、南都沦后第四乙酉生，……等大小印章三四十枚。现藏于中国革命博物馆。

按当时清朝的律例，不属本府籍贯的童生，不能参加本府的科举考试。

④ 在光绪甲辰（一九〇四）年春的最后一科岁试中，朱执信替他的表弟汪嶽（彦平）做县试的“枪手”，结果在应考的学童中，汪嶽以名列第十而得入庠。参见汪希文《朱执信先生外传》（油印本），原文载香港《春秋杂志》，一九五九年九月第五期至一九六〇年一月第六〇期。

二、由“排满”而革命

朱执信出生后的第十年，即一八九五年，清朝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遭到失败，消息传来，朱执信的父亲启连不胜忧愤。他怀着沉重的心情，将这个“噩耗”告诉幼小的儿子执信，执信听后十分悲痛、忧虑。启连对夫人说：“是儿年虽稚，有大志，他日际会风云，或能驰驱国事，期得一当也。”^①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的发展，逐渐引起朱执信的注意。当权的封建统治阶级顽固派发动戊戌政变、杀害“六君子”那年，朱执信刚满十三岁。然而，变法维新运动的失败，朱启连的好朋友杨锐的殉难，不能不给关心国事的启连和执信父子以很大的感触。朱执信在家中慷慨激昂地说：朝廷腐败到这样的地步，非要痛下决心，彻底改革，无法挽回颓局。^②

少年时代的朱执信，广泛地阅览了外祖父家中的藏书。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王安石关于改革的著述，以及王夫之发扬民族思想的论著，朱执信特别感到兴趣。朱秩如

① 张堇溪撰、汪祖泽参订：《朱执信先生年谱》（油印本），第三页。

② 参见同上书，第四页。

说：“先兄龄十余岁时，爱读王安石之文，且慕其高尚之节行。”^①朱执信自己后来也说过：“异时对于王安石，当作精深之研究。”^②胡汉民在《朱执信别记》中说：“执信则治船山学，于民族大义镌入甚深。”^③还在一九〇一年十月，朱执信就曾写过《拟明王忠文公文》，对王夫之赞扬备至，认为王夫之的文章具有怪、丽、雄、直、涵、远、洁、适、和、雅十德。^④《水浒传》、《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描述绿林造反以及记载清朝军队暴行的书籍，对朱执信亦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还常常听舅父汪兆铨给他讲述明季沦亡的痛史和清朝压迫的种种暴政^⑤，从而激发他仇恨清朝统治的情绪。

八国联军的入侵，清朝政府的投降卖国行为，给不满现实的朱执信以新的刺激，他开始更加公开和坦率地发表自己的政见。“童年应诸书院课试，常直伸己见，纵谈国事。”^⑥

朱执信纵谈国事，仇视和反抗清朝政府镇压人民的反动政策，在一九〇一年十二月所写的《读辛幼安南渡录感叹

① 朱秩如：《追忆先兄执信》，《朱执信先生殉国十周年纪念册》，第六〇页。

② 《朱执信先生殉国十二周年纪念专刊》，第一六页。

③ 《建国月刊》一卷五期，第一〇页。

④ 这是一篇以朱大符署名，广雅书院拟取文学第二名的作品，原件藏中国革命博物馆。

⑤ 朱秩如：《朱执信革命事迹述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二），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版，第四二二页。

⑥ 杨道仪、朱秩如：《执信之不计利害》，《朱执信先生殉国十三周年纪念专刊》，第二二页。

题后》这篇文章中，第一次作了较为集中的表述。这篇以朱举署名的作品，被广州的著名学府广雅书院拟取为文学第一名。朱执信在该文中含蓄地给辛弃疾的爱国思想以极高的颂扬。对于宋高宗的偏安江南，他写下了“父死迁流子死射，悔不当年殉宗社！”这样的警句。为了要人们记取宋朝灭亡的沉痛教训，他极为感慨地写道：“北狩辛劳，已羞千载，古来申鉴，岂在一时！”^①到这时，朱执信的思想显然已萌发着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志向。

一九〇二年朱执信进入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广州举办的新型学校——“教忠学堂”^②学习。在教忠学堂，朱执信接受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教学方针的综合教育。学堂“除了设置一些新学科如格致（包括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地理、历史之外，还有经学、国文、修身各科，……除此之外，还设有唱歌、图画、体操等科”^③。在学习中，朱执信一再表现了他的勤奋和才华，不仅所作文章常常“贴堂”，而且，每次考试的成绩，都名列前茅。

教忠学堂的授课虽然比过去的书院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但朱执信仍然感到不满足。于是，便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亲友们，包括古应芬、汪兆铭、汪祖泽等，组织了“群智社”，

① 朱举：《读辛幼安南渡录感叹题后》，原件藏中国革命博物馆。

② 教忠学堂是由当时广州有名的教育家丁仁长、吴道镕（后来都担任过两广高等学堂监督）和朱执信的舅父汪辛伯（后任教忠学校校长）等创办，丁仁长为第一任监督。

③ 曾绍洙：《从教忠学堂到教忠中学》，《广东文史资料》第一八期，第一四一一—四二页。

共同出资购买新书杂志，互相切磋。“群智社”虽然只是一个纯粹研究学术的小团体，但从他们阅读的书籍以及探讨的问题看来，也是具有一定政治倾向性的。它冲破了封建文化和清朝统治者的束缚，引导参加的青年学生追求民主和进步。因此，“群智社”使朱执信受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启蒙教育。

在教忠学堂和“群智社”的两年中，朱执信阅读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等西方资产阶级名著以及《浙江潮》等在国外发行的革命刊物。^①

这个阶段所接触到的学识，对朱执信来说是很新鲜的。它使朱执信开始看到中国政局日益不堪收拾、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根源，感到长此下去中国前途的可悲。又使他粗略地觉察到，那些区别于中国封建传统思想的西方资产阶级学说，言之有理，值得探究。还使他对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开始有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理解，朦胧地看到摒弃封建专制制度，吸收西方民主精华，才是中国的出路。这样，就初步树立起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思想。以“南都沦后第四乙酉生”为文刻下的两枚自用的印章，^②大概也是这个时期前后所做的事情。通过这些印章，表示了他对明朝沦亡的怀念；同时，又反映了他那强烈的反清意志。

① 朱秩如：《朱执信革命事迹述略》，《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四四五页。

② 这两枚印章现藏于中国革命博物馆。

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赴日留学风靡一时，留日学生逐年迅速增加，到一九〇四年达到了一千多人。朱执信怀着学习西方以救中国的愿望，于一九〇四年夏参加了在广州举办的官费赴日留学的考试。这次招考的留学生，以学习法政为主。在应试的二百多名学生中，朱执信以第一名被选录，为当年朝廷在广东选送的五十多名留日学生中成绩最好而又年纪最轻的人。在此以前，朱执信曾应北京的京师大学堂预科的入学试，“亦以高第入选”^①。最后，朱执信决定舍弃京师大学堂而赴日本。

一九〇四年冬，朱执信离开他从未离开过的故乡广州，前往日本。他抵达东京以后，和古应芬、杜之枚、汪兆铭、李文范、张伯桢（篁溪）等同居于东京仲猿乐町广东人开设的龙图馆。

一九〇五年春，朱执信进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第二期，学习期限定为一年半。朱执信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度过了这段留学生的生活。“凡居日本一年半，所领学费，不过六百元，而所购之书籍，凡数百元，其在日本时所居之客舍，仅三叠（三张席），每日所食，唯白饭及腌菜而已，其苦行节俭，诚有非他人所能为者。”^②

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设政治、法律、经济等专门课程，朱执信对经济学科尤其重视；并不遗余力地钻研数学。“他校数学专攻科之学生，往往以深奥难解之题，质之执信，执

^{①②} 朱秩如：《先兄执信行状》，《朱执信集》下册，上海民智书局一九二五年版，第六九二页。

信凝思有顷，辄跃然曰：得之矣！……由是众始惊其造诣之深。”^①朱执信以优异的成绩，在毕业试中名列前茅。与此同时，他还大量地阅读了许多课外读物，包括那些阐述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不同学派和观点的各种著述。朱执信的这些学业上的成就，为他在政治、经济理论方面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留学日本期间，朱执信交朋结友，结识了一些资产阶级革命者，自由探讨和研究问题，使这个长期禁锢在老朽的封建帝国，未出过国门的青年，眼界更加开阔，对封建专制制度有着更大的痛恨。就在朱执信刚到日本之际，日俄战争正在中国的东北境内剧烈进行，使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沉重的祸害。朱执信对于清朝政府宣布“中立”造成的奇耻大辱，十分不满，“慨然曰：‘祸国殃民，至斯而极，若不急起图存，国将不国。图存之道无他，首在光复故土，排满兴汉已耳。’”^②

这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保皇活动，极为嚣张。尤其是梁启超，他以犀利的笔锋，先后藉着《清议报》、《新民丛报》为阵地，在中国留日学生中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他们鼓吹君主立宪，诋毁革命，分化革命派的团结，使一般知识分子在革命与保皇之间，一时无所适从。

朱执信虽然对梁启超流畅的文字表示非常敬佩，但却

① 胡汉民：《朱执信别记》，《建国月刊》一卷五期，第一〇页。

② 张莹溪撰、汪祖泽参订：《朱执信先生年谱》（油印本），第六页。

不屑与他交往。在资产阶级改良派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较量中，他毫不犹豫地站到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行列中来。

一九〇五年七月三十日，孙中山邀集了包括兴中会、华兴会以及其他革命团体旅日的部分成员，共七十多人，在东京举行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朱执信由胡毅生介绍，参加了这次筹备会议，成为中国同盟会的最早加盟者之一。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日，朱执信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的正式成立大会。孙中山被推举为中国同盟会总理。总理之下，分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朱执信被选为评议部评议员兼书记。从那一天起，年仅二十岁的朱执信，就成了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和得力助手，成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革命组织的重要骨干。